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編之一三

辛亥革命時期兩湖地區的革命運動

李時岳著

大東圖書公司印行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編

辛亥革命時期兩湖地區的革命運動

李時岳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大東圖書公司印行

3813/22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編
辛亥革命時期兩湖地區的革命運動
李時岳 著

*
大東圖書公司印行

代表人：劉志強
香港軒尼詩道123號13樓

*
1980年10月香港第一版

出版說明

辛亥革命，武昌起義，各省響應，清社以屋。事後各方持論，認為「事件出自突發，成功得之意外」，故革命果實，落於與革命漠不相關之人物手中，如黎元洪乃最顯著一例。據居正『辛亥筭記』：「黎元洪出任都督，有謂劉賡藻引蔡濟民率兵至黎寓，自其室中挾出者，有謂自其牀下挾出者，又有謂自其參謀家挾出者，倉卒間傳說不一。」當時羣龍無首景象，概可想見。

本書編纂，旨在闡明武昌起義成功之因素，則有來自，厥非意外。首先縷舉辛亥革命發生時，兩湖地區社會各階層之政治趨向；次將湖北首義之區黨人態度、武昌起義後軍政府之演變、武漢保衛戰與軍政府對袁世凱勾結，分析透闢；又次將湖南在辛亥革命前，革命運動之進行狀況，長沙起義後，革命派與立憲派之激烈鬥爭，發生政變血案，使革命果實被立憲派所篡奪；最後記敘兩湖地區人民，對革命果實篡奪者進行鬥爭經過，其資料取材，著者在其後記云：「兩湖地區人民，反抗革命果實篡奪者的鬥爭，幾乎全無著述可憑。無可奈何，只好求助于當時的報紙，而報紙的新聞報道，一般都是簡單而又片面，以至于重現這些鬥爭的面貌，都感到非常困難。我雖作一些努力，但是否完全合乎當時的實際，應該說還是一個問題。」此種資料，頗饒參考價值，因輯入本叢編，藉供治近代中國史者之甄選。

大東圖書公司編輯部

一九八〇年十月

辛亥革命时期
兩湖地区的革命运动

李时岳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1957年·北京

目 次

第一章	导言	1
第二章	辛亥革命的一般进程	4
一	二十世紀初年的中国	4
二	革命的迅速胜利与袁世凱窃国	17
第三章	兩湖地区社会各阶層的政治趋向	35
一	农民的痛苦与斗争	35
二	工人运动	41
三	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45
第四章	“首义之区”的湖北	52
一	革命党人的活动	52
二	武昌起义和湖北軍政府的演变	67
三	武汉保衛战与軍政府的反动	82
第五章	革命派与立宪派斗争最激烈的湖南	91
一	革命运动的发展	91
二	長沙起义和起义后的政变	98
第六章	兩湖地区反对革命果实篡夺者的斗争	106
一	农民运动的被镇压和黑暗統治的恢复	106
二	下層革命党人的反抗風潮	114
三	兩湖与“二次革命”	119
第七章	結束語	125
后 記		132

第一章 导言

辛亥革命，如毛澤东同志所指示的，在比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个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本書企圖比較詳細地叙述兩湖——湖北和湖南地区革命發展的經過，來說明、印証辛亥革命过程中的某些重要問題。

辛亥革命这个全国規模的革命运动是以各省起义和“独立”的形式展开的。不同地区，因其条件之不同，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揭出这些特点，就可以丰富辛亥革命史的内容，更完整地显示辛亥革命史的面貌。

不仅如此。

兩湖地区的革命运动在辛亥革命史上还具有一定程度的典型的意义。簡單地說来，湖北是“首义之区”，湖北的革命分子長时期潜伏在清朝的軍隊中作士兵或下級軍官，在那里建立革命組織和扩大革命思想的影响，准备了起义首先在武昌获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他們的工作比其他地区的革命分子联络軍隊的工作要深入得多，可以称为典范。武昌起义的槍声，开始了全国革命胜利进軍的凱歌，武汉保衛战是反抗清政府軍事鎮压的唯一战斗，湖北人民对革命作出了不朽的貢獻。但就在革命凱歌行进中，湖北的革命政权又是最先落入原来反对革命的旧人物之手的，它說明了

当时革命党人在政治上的幼稚与软弱，显露了日后陷革命于失败的征兆。湖南是革命派和立宪派的斗争表现得最尖锐的地区。临时附和起义的立宪党人，为了夺取政权，不惜发动流血政变，杀害革命的领导者。这一事实，充分地反映了辛亥革命过程中各种社会力量的矛盾与斗争以及这种斗争的趋势。

因此，考察两湖地区革命发展的经过，对于辛亥革命前革命分子是怎样进行活动的，起义是怎样爆发的，革命果实是怎样被篡夺的等问题，也就是革命如何取得一些胜利和为什么终于失败的问题，可以得到部分的而较为典型的解答。

不仅如此。

当黑暗反动势力篡夺了国家权力之后，当时革命人民，特别是下层革命党人，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呢？这是一向被人忽视了的问题。在一些辛亥革命史的著作里，民国成立后，往往只看到政党政客们的排列组合、权力纠纷，往往只看到革命党的上层分子和封建官僚、立宪党人握手言欢，“咸与维新”，尽成“新贵”，却看不到下层人物的反映。似乎人民群众对于革命的失败是毫无感觉的，对革命失败后的压迫是漠不关心的。事实决不会是这样。两湖地区的情况就证明：反革命篡夺政权之后，并不是万事大吉的，他们不得不撕毁“共和”、“民主”的假幕，露出狰狞的面目来和人民作战。农民运动继续增长着，下层革命党人不断地掀起了反抗革命果实篡夺者的斗争，只是由于革命的人民得不到

革命的領導，才沒能挽救革命的失敗。

對於兩湖地區人民反抗革命果實篡奪者的鬥爭的初步探討，提供了進一步研究當時全國政治情況的線索。這個研究，將可以充實從 1911 年的革命到 1913 年的革命（“二次革命”）之間革命演變的內容和揭示革命發展的規律。

在 1913 年的所謂“二次革命”中，“響應”了革命的湖南，由於反革命的操縱，實際上破壞了、抵制了革命；而 1911 年的“首義之區”——湖北，則變成了反革命鎮壓革命的兵站與糧台。其中的教訓是發人深省的。

總之，闡明兩湖地區的革命運動發生和發展、勝利與失敗的真實過程，將有助於更深刻地揭示辛亥革命的發展規律及其經驗教訓。

兩湖是整個中國的一部分，為說明這一部分地區革命發展的經過，不能不首先對辛亥革命的一般進程作必要的敘述。湖北和湖南的革命運動雖然息息相關，但也各自具有特點，為了顯示這些特點，採取了分別敘述的形式。

第二章 辛亥革命的一般进程

一 二十世紀初年的中国

中国資本主义的發展 革命的根本原因，在于新的生产力与衰朽的生产关系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和冲突。

中国是世界文明發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社会的發展，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經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到了封建社会的末期，出现了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中国社会按照自己独立發展的規律，如果没有外来影响，必然会發展为資本主义社会。但是，外国資本主义的侵入，打断了中国社会独立發展的进程。“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發展資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近代史。”^①为了奴役和掠夺中国人民，外国侵略者对中国采用了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各种压迫手段，并和中国的封建統治者結成反动联盟，把中国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

資本主义强盜們是極力阻撓中国在經濟上和社会生活上的进步的，然而为了侵略的必要，又不可避免地促进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对立物——中国民族資本主义的發

^① “毛澤东选集”第1版第2卷第651頁。

展。外国的低廉商品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經濟，破坏了中国城市和乡村的手工業，“自然經濟的破坏，給資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場，而大量农民和手工業者的破产，又給資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場。”^①这样就給中国資本主义生产的發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

事实上，1840年的鴉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太平天国革命給予封建統治以严重打击以后，在外国資本主义刺激之下，一些民間工商業者便逐漸采用机器来进行生产，磚茶、繅絲、軋花、火柴、豆餅、造紙等工厂陸續出現。这些工厂都是建筑在中国已有的广泛的手工業基础之上的，其中相当大的部分原来就进入了手工工場阶段。广州繅絲厂（1880年已有10家，1894年有30多家）、宁波軋花厂初办时多用手搖机，許多火柴厂初办时还是半手工、半机器，由手工業向机器工業發展，这應該是中国資本主义發展的正常道路。但是，由于这些工厂一般都是資本少，規模小，技术落后，在外国資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严重压迫下，其發展是極其艰难和緩慢的。

从60年代起，在中外反革命势力共同鎮压中国人民革命的基础上，以曾国藩、李鴻章为首的反动統治者开始倡行“自强新政”，最初以創辦軍事工業为中心，后来發展到“求富”——举办一些民用工業。如果說，“自强”的軍事工業，虽然使用了机器，但它（一）不是商品生产，（二）从制造、販

^① “毛澤东选集”第1版第2卷第597頁。

运到購買，都不許人民插手，只是中国二、三千年來封建統治者壟斷軍火製造的延續，（三）工人類似封建時代官府工業的工人，壓迫他們的不是資本家而是封建官府，所以並不具有資本主義性質；那末，“求富”的民用工業就有所不同了。就其由官府支配、生產有特定目標和特定需要（如左宗棠開辦蘭州織呢廠的目的之一就是生產軍用氈）等方面說，仍帶有濃厚的封建性；但就其為利潤、為市場而生產等方面說，又具有資本主義性質。企業內部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及其消長，決定着這些企業的發展。封建性濃，企業變成了官僚機構，不計成本，不顧市場，便必然失敗。企業的利益要求資本主義戰勝封建主義。經過曲折的鬥爭，資本主義逐漸沖破了封建主義的壓制，企業由“官辦”、“官督商辦”而“官商合辦”、而完全“商辦”，一部分地主、官僚和大商人通過這條道路轉化為資產階級。

如果說，1894年中日戰爭以前，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還非常緩慢而微不足道；那末，中日戰爭以後，發展便較為迅速，到1905—1908年間則出現了大的躍進。1908年以後雖然又呈現萎縮，但比1905年以前還是有所增長。下列各階段設立的廠礦和資本的總數以及各階段的每年平均數，顯示了這種發展的趨勢：

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統治秩序是不相容的。由於1904年的日俄戰爭，帝國主義暫時放寬了對中國的經濟壓迫，據“國風報”的報道，1906、1907年兩年間，“民之投資於實業者若鶩”，但不久壓迫又加緊，1908年

年 份	厂 矿		資 本 (元)	
	总 数	平均每年	总 数	平均每年
1872—1894	74	3	20,636,838	896,384
1895—1904	134	13	40,181,065	4,018,107
1905—1908	220	55	73,192,225	18,298,056
1909—1911	68	23	17,182,494	5,727,498
年 月 不 明	25	—	7,462,190	—
共 計	521	—	159,654,812	—

材料来源：严中平等編：中国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选輯，第93頁。

投資于实業的“已銳減”^①，1909年則“如上海、天津、汉口等埠，向称繁盛，曾几何时，情态大异。富商巨肆，倒閉頻聞，且对于外人，負債累累。”^② 1910、1911年更是每况愈下，市面蕭条，物价騰貴，銀根緊迫，恐慌大起。巨大的金融風潮在1908年和1909年各發生了3起，1910年發生了8起。其中如上海正元錢庄的破產，牽動全市，其他各庄相繼倒閉，恐慌波及汉口、天津、營口和長江沿岸各埠；接着拥有17家支店的有名票号源丰潤也告枯竭，影响及于全国。1911年仅上半年便發生了5起金融風潮，其中如拥有27家支店的南京义善源票号的破產，恐慌波及上海、北京、濟南、長江一帶以至福建和广东。接二連三的金風潮，深刻地显示了整个工商業的危机。梁啓超甚至指为“国民破產之噩兆”，慨嘆“來日大難，宁堪設想！”^③

① “國風報”第1年第1号：“中国最近五年間实業調查記”。

② “國風報”第1年第2号：“宣統元年生計界”。

③ “國風報”第2年第14号：“国民破產之噩兆”。

为了給民族資本主义扫清道路，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統治，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但是，正如范文瀾同志所說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从民間普通工商業者上升的，因条件困难，前进緩慢，成为资产阶级的下層，在表現新社会發展的趋向上比后一个较为强烈些；一个是从地主官僚和一部分商人轉化的，因政治条件較好，資金較大，得較快的前进，成为资产阶级的上層或实力派，在表現新社会發展的趋向上比前一个更軟弱些。”^① 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从一开始就不是統一的，表现为革命和改良兩条道路的分道揚鑣。

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和人民反抗斗争 1894年，偉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創立了兴中会，第一次揭示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号召，并組織了反清起义。1898年的戊戌变法和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失敗之后，大批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識分子趋向革命，革命書报的出版如雨后春笋，光复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相繼成立。1905年，兴中会、光复会和华兴会等联合組成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同盟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宣布了“驅除韃虜、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民主主义革命綱領，創辦了“民报”，和当时的改良派——君主立宪派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从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成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領導思想。

①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2集：范文瀾“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問題”。

民族主义号召人們为汉族的独立而斗争。孙中山指出：推翻滿洲貴族的統治，不仅因为它残酷地压迫汉族人民，而且因为它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因为它的腐朽、反动而給中华民族带来了無穷的耻辱与灾难。饱受滿洲貴族和帝国主义百般欺凌的中国人民，是充分懂得民族独立之重大意义的。先进的中国人，不仅要求建設一个独立、自由的中国，而且还表示了只要力所能及，將援助世界上其他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偉大願望。章炳麟在闡明民族主义的含義时說：“吾曹所执，非封于汉族而已。其他之弱民族有被征服于他之强民族而盜窃其政柄、奴虜其人民者，苟有余力，必当一匡而恢复之。嗚呼！印度、緬甸之灭于英，越南灭于法，辯慧慈良之种扫地尽矣！故吾族也則当返，非吾族也，孰有聖哲旧邦而忍使其遺民陷为台隶？故圓滿民族主义者，則当推我赤心，救彼同病，令得处于完全独立之地”^①。这种偉大的願望，閃爍着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革命思想的燦爛光輝，显示了中国人民崇高的道德心和正义感。

民权主义号召人們为政治民主而斗争。饱受封建專制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是迫切地要求民主权利的。同盟会庄严地宣布：“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而有参政权，……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②

孙中山在“民报發刊詞”上写道：“今者，中国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殘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

^① “章氏叢書”，“別錄”卷3第43頁。

^② “總理全集”，近芬書屋初版“方略”第2頁。

不可以須臾緩”^①。說明斗争的目标是推翻清朝統治、廢除封建制度——异种之殘、千年專制之毒和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外邦之逼。但是，当时的革命者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認識还比較模糊，对帝国主义势力也有所畏惧，而且以为只要推翻清朝，实行民主，中国就强盛了，帝国主义也就不会侵略中国了。因此，为了首先專力推翻清朝統治，他們曾幻想避免和帝国主义正面冲突以及得到汉族封建势力的支持。

民生主义号召人們为幸福生活而斗争。按照孙中山等人的解釋，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它表明資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在西方已經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社会主义則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鈞之力，磅礴于世界。因此中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向西方借取了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战斗旗帜之一，为的是不讓自己看見自己斗争的资产阶级的狭隘内容。但是，中国的客观条件并没有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民生主义幻想不經過資本主义而达到社会主义，實質上却是中国资产阶级希望他們的共和国能够和人民，特别是农民建立良好关系而获得長久的寿命，不致在革命以后不久又發生社会主义革命。从民生主义思想中所得出的平均地权、土地国有，事实上也就恰恰是反对封建主义的“純粹資本主义的、最大限度資本主义的土地綱領。”^②

这样，就構成了中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完整的思想体系。

① “总理全集”，近芬書屋初版，“杂文”第13頁。

② “列宁斯大林論中国”，人民出版社，第29頁。

它号召人們为独立、自由、民主、幸福而斗争，期望中国經過革命以后，不仅变成一个独立的“民族的国家”和民主的“国民的国家”，而且变成一个人人都过着幸福生活的“社会的国家”。“三民主义”的号召，获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同盟会成立后不到一年，会员人数迅速扩展到万人以上，内地各省相繼建立分会(可考的有广西分会、江苏分会、南京机关部、湖北分会、大連辽东支部、福建分会、湖南分会、河南分会、贵州分会、广州机关部、陕西分会、山西分会等)，在全国广泛地撒开了革命的火种。

同盟会不仅安排了宣传和組織工作，而且發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例如1906年在萍乡、瀏陽、醴陵地区的起义，1907年在潮州黃崗的起义、在惠州七女湖的起义、在欽州和防城的起义以及在欽州、廉州和上思一帶的游击战，1908年襲取河口的战斗和在安庆的新軍起义，1910年的广州新軍起义和1911年在广州的起义等。連續不断的起义振奋着人心，起义者的勇敢和牺牲精神在广大群众中引起了尊敬，激發着人民的革命情緒。

二十世紀初年，中国的統治者業已完全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代理人。清政府为了繼續維持其反动統治，把中国的一切主权都零售躉卖給了帝国主义强盗。于是，上海外滩(帝国主义銀行所在地)掌握着中国的經濟命脉，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館所在地)成了中国的太上政府，整个国家在走向殖民地化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激發着人民的爱国义憤。1903年